

「人文精神」討論的誤區

● 劉為民

大陸學界近年展開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仁智互見，對於不甚活躍的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也為市場經濟時代的文化繁榮、思想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蓬勃的活力。但是無可諱言，參與這場討論的論者大多孤立地講「人文精神」，而看不到、甚至人為地割裂了「科學」與「人文」在人類精神發展過程中的內在關聯，這是需要認真總結並加以辨析的。如王一川說^①：

我們所謂「人文精神」，正是從各門「人文學科」中抽取出來的「人文領域」的共同問題和核心方面——對人生意義的追求。

他還明確地指出：

由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共同分享的「科學精神」，竭力排除人文因素的參與，追求純粹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而「人文精

神」則恰好要把為這種「科學精神」所排斥的人生意義搶救出來。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般是有「人文」而無「學科」的。「人文學科」在中國出現亦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是伴隨着「西學東漸」，以自然學科為其基礎，它的形成大致與各社會學科同步。因此，在世紀末的今天討論「人文」話語，就應該扣緊人文主義與近現代的科學，及其對中國社會、民族精神已經形成和正在產生深刻的影響及作用。我們很難理解把「人文精神」的意義僅僅限定在「從各門『人文學科』中抽取出來的『人文領域』」中，而又危言聳聽地要把「人生意義」從「科學精神」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中「搶救」出來。

正是由於這種對「人文精神」的認識分歧，往往使我們無法正確地從普遍性與個別性的聯繫上去探索「人文精神」的實踐意義。朱學勤認為^②：

一個技術型知識份子，可以只完成科

大陸學界近年展開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參與這場討論的論者大多孤立地講「人文精神」，而看不到、甚至人為地割裂了「科學」與「人文」在人類精神發展過程中的內在關聯，這是需要認真總結並加以辨析的。

學責任，不承當對社會的關注。但是人文學者之所以稱為人文學者，就在於後面這一點社會關注。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命題。當代任何一位科學工作者（當然包括所謂「技術型知識份子」），都不「可以只完成科學責任」而「不承當對社會的關注」。況且，「生態失衡」、「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等「對社會的關注」，早已是全球科技工作者的共識。是誰賦予「技術型知識份子」例外而特殊的權力？朱學勤接下來的質問顯得更滑稽，他說^③：

你處理你的人文研究課題時，可以取技術主義態度，價值中立。但卻不能將這一點擴散開來，遮蔽對社會的關注。否則，你與技術型知識份子有何差異？只不過是個以人文對象為研究職業的技術型知識份子而已。

顯然，這裏潛含着一種人文學者與「技術型知識份子」的價值對立，而他借孟子的話把這種「對立」推向了「人」、「獸」之「異」。孟子說：「人異於禽獸，幾希？」朱學勤認為「這個『幾希』，即『人文精神』之所在」。在他看來，「我們現在可以說：『人文主義學者異於技術主義學者，幾希？』這個『幾希』，即人文主義者最難堅持，但也必須堅持的最後那麼一點東西。」然而，「終極關懷」、「道德價值」與人文理性，是不是「人文學者」的「專利」？針對這個問題，有沒有必要從知識份子中單獨剔出一類所謂「技術型知識份子」來作陪襯或靶子？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完全忽略了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正是以科學為基石的「技術」與「技術型知識

份子」的價值實現及社會活動，創造了近現代的市場與生產力，並由此醞釀、萌發出新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向全世界擴張。於是，才有了以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為代表的一連串地理大發現；才有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德國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科學的進步與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宗教蒙昧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歷史地結合起來。當時西方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科學家針對傳統經院哲學的信仰主義、蒙昧主義，強調人的經驗、理性，推崇知性和人的主體權威，宣傳大自然和先進的宇宙觀，讚美科學，衝擊、改造了整個時代的知識結構、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從而又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整個社會的歷史變革，開闢了邁向現代化的道路。

顯然，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科學在整個西方社會及其文化精神變革中的重大作用；同時，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完全無視這種歷史「語境」。在中國，先有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及洪若瀚（所謂法國「皇家數學家」）和馬禮遜等傳教士為代表的「西學東漸」，把西方近代科學帶到了中國；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又由堅船利炮給我們造成的民族屈辱，孕育、激發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至劃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人」才開始了真正「現代」的歷史過程。就像當年哥白尼「天文革命」對西方神學世界的顛覆性衝擊一樣，上個世紀末以赫胥黎《天演論》、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為代表的近代科學思想，猛烈、深刻地影響了五四前後的中國社會。對此，胡適曾作過明確的回憶：「《天演論》出版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

對於「人」的現代性的科學理性定位，應該是我們討論「人」、「人文」及其「精神」的邏輯起點。那種徹底脫離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憑空「搶救」所謂「人生意義」的想法，並不符合人類思想發展的客觀實際。

燒着許多少年的心和血。」作為新文化重要陣地的《新潮》雜誌，在創刊伊始就以卷首位置發表文章指出：「人對於自身透徹的覺悟，總當說自達爾文發刊他的《物種由來》和《人所以出》兩部書起。……這三種科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發明之所以為人的生物學家主張的總是『進化論』。」反映到文學方面，便產生了五四時期著名的「人的文學」的口號，周作人也有過準確的闡述：「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顛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這種對於「人」的現代性的科學理性定位，應該是我們討論「人」、「人文」及其「精神」的邏輯起點。那種徹底脫離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憑空「搶救」所謂「人生意義」的想法，並不符合人類思想發展的客觀實際，因而也失去了其真正的現代性與有效性，更不能與五四先驅們奠基開創的現代文化系統「對話」以至融會貫通。當然，這裏強調「人」的科學性並不是着重於他的「動物」性，而是強調其進化的本質。這種基本的現代科學認識，卻往往被我們的「人文精神」尋求者忽略或者遺忘，甚至在思維邏輯上恰恰相反，不是求發展、求進步，而是回歸傳統。他們為改變某些現實狀況，寄托於上古時代的「潔」的精神，推崇荊軻式「一諾千金、以命承諾、捨身取義、義不容辭」的「血勇」氣概，讚美這是「40個世紀以前播下的高貴的種子」，並且要「等待這種高潔美的勃發」④。許紀霖明確地講⑤：

我們可以將人文精神理解為一種新的

「道」，這種「道」不再期望以意識形態的方式將學術和政治「統」起來，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層次上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整合提供意義系統和溝通規則。……人文精神為政統世界提供終極性的合法性資源，而後者又以制度化、體制化的形式保證人文理想在現實生活中有條件的實現。人文精神同樣促使學者在學術工作中不致墮入純粹的技術主義，在知識關懷的同時依然保持人文關懷，而學術工作又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充足的知識資源。

這裏，以人文學者自重的精神優越感，不僅劃清了與「技術主義」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張揚所謂「人文精神」的同時，也實際宣揚了一種「人文」與「技術」二元對立的價值觀。由於這種「道統」化的「人文精神」能夠「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整合提供意義系統和溝通規則」，所以特別容易得到人們的青睞與認同，也因而更便於把其對立面——「技術主義」推向非「人文」甚或是反「人文」的境地，使其承受不必要的貶抑和批判。

實際上，在今天「純粹的技術主義」的「學術工作」，也不可能和社會系統、價值範疇徹底絕緣。甚至，純粹的科技知識份子也同樣具備普泛意義上的人文理性和「終極關懷」。陶東風曾客觀地描述了當今中國社會的「知識結構」變化形態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的兩大系統——人文知識與科技知識，以及知識主體（知識份子）的兩大群體——人文知識份子與科技知識份子的結構關係的變化；亦即人文知識及人文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以及科技知識及科技知識份子的中心化。

以人文學者自重的精神優越感，不僅劃清了與「技術主義」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張揚所謂「人文精神」的同時，也實際宣揚了一種「人文」與「技術」二元對立的價值觀。而我們的「人文精神」尋求者往往不是求發展、求進步，而是回歸傳統。

「人文精神」大討論中一再出現的對於「科學」、「技術」的疏遠、貶抑乃至抗拒，是顯而易見而又不容忽視的。應該提問的是，背棄乃至拒斥科學技術，能不能產生真正的「人文精神」？！

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接下來他說：「人文知識以及人文知識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其御用化為代價而取得的，它們與政治權力中心的過於緊密的關係導致了其自身獨立品格、自主精神及自身話語規則的喪失。」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外因」論觀點。人文知識及其精英的中心地位失落和自身話語失範，確實與政治文化霸權和經濟實用主義有關，但更本質的問題還在於這種人文知識及其精英的系統本身。我一直懷疑我們的「人文知識」到底具有多少符合科學規律的人文理性？而且，能否把科技知識與人文知識放在同一層面來考察其作用和價值？所以，陶文中所謂「人文知識及人文知識份子的作用與存在價值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科技知識、科技精英的作用和存在價值同樣如此」。我認為恰恰相反，科技知識及其精英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不同時代的人文價值觀，其基礎是對人、人性的本質認識；而任何時候的人文知識都無法取代科學技術的獨立品格和價值、意義。陶文認為「只有保持這兩者在知識體系內部和精英結構內部的動態平衡，防止單方的惡性膨脹，才能使知識的推進保持最優狀態」。我們的理解是：由於政治話語霸權的歷史作用而導致人文知識的「惡性膨脹」，這種現象可能存在過，我們應記取其中教訓；但科技知識及其精英，怎樣才算是「單方的惡性膨脹」呢？這裏不僅表現出思想方式上的「人文—科技」二元對立；還隱隱透露出一部分人文學科工作者在面對現代科技發展的時代潮流時，自然而不自覺的內心恐懼！他們不善於從現代科技的歷史進步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思

想營養，也很少主動學習科技知識，以改善、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所以，從學術觀到潛意識，他們都往往存在着一種與現代科技發展的情感距離。

總之，在「人文精神」大討論中一再出現的這種對於「科學」、「技術（主義）」的疏遠、貶抑乃至抗拒，是顯而易見而又不容忽視的。它適應了當今知識—文化界的某種潛在情緒和接受心境。歷史地看，它又是幾代人的知識結構中缺乏科學素養所導致的精神「孑遺」；本質上極其突出地直接影響到今天我們的人文精神建設問題——無視科學的重要性。應該提問的是，背棄乃至拒斥科學、技術的時代發展，能不能產生真正適應現代化需要的「人文精神」？！

註釋

- ① 王一川：〈從啟蒙到溝通——90年代審美文化與人文精神轉化論綱〉，《文藝爭鳴》，1994年，第5期。
- ②③ 朱學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一〉，《讀書》，1994年，第3期。
- ④ 參見董之林：〈人文精神討論述略〉，《光明日報》，1995年6月21日。
- ⑤ 許紀霖：〈道統、學統與政統——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三〉，《讀書》，1994年，第5期。
- ⑥ 陶東風：〈中心與邊緣的位移——中國知識精英內部結構的變遷〉，《東方》，1994年，第4期。

劉為民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現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作博士後研究。